

东北亚五国

国际关系思想与理论流派

巴殿君　徐　博等◎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东北亚五国
国际关系思想与理论流派

巴殿君　徐博等◎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北亚五国国际关系思想与理论流派 / 巴殿君等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22.4

ISBN 978-7-5012-6416-2

Ⅰ.①东… Ⅱ.①巴… Ⅲ.①国际关系—研究—东亚 Ⅳ.①D8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1）第 192437 号

责任编辑　狄安略
责任出版　赵　玥
责任校对　陈可望

书　　名　东北亚五国国际关系思想与理论流派
Dongbeiya Wuguo Guojiguanxi Sixiang yu Lilun Liupai

作　　者　巴殿君　徐博　等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100010）
网　　址　www.ishizhi.cn
电　　话　010-65265923（发行）　010-85119023（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13½印张
字　　数　204 千字
版次印次　2022 年 4 月第一版　2022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6416-2
定　　价　8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研究国际关系思想是探讨和思考当代国际关系现实与现象的基础。一个国家的国际关系思想深刻植根于其文化和历史传统之中，是其政治文化乃至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亚国家由于历史和文化的不同，在近现代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于传统西方范式的国际关系思想。这些国际关系思想是世界政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我们理解和探寻东北亚国家国际关系行为的重要根基。同时，随着非西方国家国际影响力的扩大，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也在日益发展成熟，而东北亚国家国际关系思想作为其中最为重要的分支之一正在得到越来越多国际关系学者的重视。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了解和研究东北亚国家的国际关系思想和理论流派，对于我国的未来发展以及周边环境的塑造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本书详细介绍了东北亚国家具有较强影响力的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包括中国、俄罗斯、日本、蒙古、韩国等五国的国际关系思想，探讨了这些思想的产生基础以及发展过程，综合阐述了当前东北亚五国所存在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对比分析了这些理论流派的主张与研究范式，为人们进一步了解、研究东北亚国家的非西方国际关系思想打开了一扇窗口。同时，我们希望以此促进更多相关学者与专家参与到研究东北亚国家国际关系思想与理论的研究中。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具体章节负责如下：第一章：王箫轲、巴殿君、孙木；第二章：斯维特兰娜·卡尔玛耶娃、丁慧文、徐博；第三章：沈和、巴殿君；第四章：巴殿君、欧德卡；第五章：王园。全书由巴殿君和徐博负责章节结构设计和组织编写。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国际关系思想的发展与理论流派 …… 1

第一节　中国国际关系思想的起源与发展 …… 1

第二节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引进与创新 …… 18

第三节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形成与争鸣 …… 26

第四节　全球化时代中国国际关系思想的新发展 …… 37

第二章　俄罗斯国际关系思想的发展与理论流派 …… 57

第一节　俄罗斯国际关系思想的基础 …… 57

第二节　俄罗斯国际关系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 67

第三节　当代俄罗斯国际关系理论的流派与新趋势 …… 80

第四节　当代俄罗斯国际关系思想影响下的“东转战略” …… 87

第三章　日本国际关系思想的发展与理论流派 …… 96

第一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的国际关系思想 …… 96

第二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国际关系思想的发展 …… 104

第三节　当代日本国际关系理论的思想流派 …… 111

第四节　当代日本的国际关系研究机构 …… 125

第四章　蒙古国际关系思想的发展与理论流派 …… 131

第一节　蒙古国际关系思想发展的历史 …… 131

第二节　当代蒙古国际关系思想 …… 139

第三节　蒙古参与国际合作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 …… 152
第四节　当代蒙古的国际关系研究机构 …… 158

第五章　韩国国际关系思想的发展与理论流派 …… 166
第一节　韩国国际关系思想发展的历史 …… 166
第二节　当代韩国国际关系思想流派 …… 176
第三节　当代韩国国际关系学评析 …… 182
第四节　当代韩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机构 …… 189

第一章

中国国际关系思想的发展与理论流派

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产生相对较晚，但国际关系思想却由来已久。尽管在近代以前，中国及其周边国家并不是西方语境中所谓的“民族国家”，但中国在处理国家间关系的过程中依然形成了一系列内容丰富、别具特色的国际关系思想，并为今天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立、创新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素材。

第一节　中国国际关系思想的起源与发展

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公元前5世纪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记录，以及17世纪英国政治学家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思想；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哲学思想渊源则是17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和18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等人的思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诞生的英国学派继承了17世纪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的遗产，也更多地从欧洲18世纪和19世纪的外交及国际关系实践中得到了灵感，后来又从欧洲一体化发展中补充了营养。[①] 而中国国际关系思想、理论的创立与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古代的政治实践，以及古代政治家、思想家们对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思辨与探索。

一、中国古代的国际关系思想

先秦时期，尤其是西周时期，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萌发的主要年代。从

①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3期，第9页。

商朝到周朝，是古代中国社会从巫史文化转向人文社会的重要节点。政治文化也从原始宗教文化转向伦理道德文化。商朝末年，纣王无道，大臣祖伊进谏说："天子！天既讫我殷命。格人元龟，罔敢知吉。"纣王回答说："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① 祖伊所言的意思大致是，天意恐怕要灭亡我们殷朝了。贤人和能测知吉凶的大乌龟，也见不到吉祥的征兆了。纣王则相信天命仍然在他身上，说明商朝统治者仍用天命的权威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但在周人推翻殷商统治的过程中，周朝的统治者目睹了相信天命的纣王走向灭亡的经过，从而认识到必须改变对"天命"的认识。由此，"天命靡常"这一命题正式修正了商汤以来"天命不僭"的思想，西周统治者逐渐形成了"敬德保民"的政治思想，并发展出了以"礼"确定社会秩序的伦理观念。"礼"成为影响中国政治两千余年的重要思想内核，以文化感召力为核心、以礼制为架构的宗藩制度成为古代中国处理对外交往的主要形式。

在这一时期，还诞生了另一个与国际关系直接相关的概念——"天下"。"天下"观念在商代奠基，在周代最终形成。在周王城外围，以五百里为一区划，由近及远分为甸服、侯服、绥服（又称"宾服"）、要服、荒服，合称五服。服，即服侍天子之意。这成为周天子"认识、想象、描述和管理天下的差序等级结构"，② 即"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③ 后来又产生了"九服"的说法，即"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④ 这说明，在周朝基本形成了"内诸夏而外狄夷"的华夷秩序观。在这一秩序内，天子和中原诸侯是诗书礼乐之邦，蛮夷戎狄属于外邦，整个天下以代表了华夏文化的中原（中国）为中心无限地向外延伸。

---

① 《尚书·商书·西伯戡黎》，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整理本），第5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08页。

② 王铭铭：《作为世界图式的"天下"》，赵汀阳主编：《年度学术2004》，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0页。

③ 《国语·周语》。

④ 《周礼·夏官司马·大驭/形方式》。

到了东周时期，诸侯纷起，国家间的交往和冲突空前频繁，这也使得春秋战国时期成为中国国际关系思想大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

对国家间关系方面的论述在春秋战国时期就能找到内容丰富的记载。《孙子兵法》里“兵者，国之大事”是最早的关于国际关系的论述之一，墨子的《非攻》则是和平主义国际关系的始祖。春秋时讲求实效和谋略的纵横家们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纵横论，到了战国时发展成为较成熟的国际关系理论。南北曰纵，东西曰横。苏秦游说六国联合抵抗强大的秦国，称合纵；张仪游说诸侯事秦，称连横。[①] 而《左传》中的“烛之武退秦师”，《吕氏春秋》中的正义战争论、国家利益论、国家崛起论、战略诚信论、战争根源论[②]等都是关于国际关系的论述。这些著述虽然没有系统地阐述国际关系理论，但是其中关于国际关系的论述对中国国际关系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孙子兵法》是我国古代最经典的军事著作之一，其中不仅包含丰富的军事理论，也蕴含了大量的外交思想；不仅对当时封建国家的历史兴衰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千百年来国内外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思想渊源。《孙子兵法·始计篇》开篇第一句说：“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③] 意思是战争是国家大事，关乎军民的生死，关乎国家的存亡，不能不慎重对待。这并不是说孙子主张采取战争的手段处理国家间的关系。在对待战争的问题上，《孙子兵法·谋攻篇》提道：“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④] 可见孙子并不主张采取战争手段解决国家间的冲突。他认为计谋与外交是处理国家间关系的首选方式，其核心精髓是以最小的代价解决国家间的争端。进入现代社会，这一思想也在国内外被广泛借鉴。最先注重对这一思想进行研究的是英国学者利德尔·哈特。1963年，他在格里菲斯的英译本《孙子兵法》序言中写道：“在导致人类自相残杀、灭绝人性的核武器研制成功后，就更需要重新而且更加完整地翻译《孙

① 邱宏亮：《均势与制衡——三国鼎立时期孙吴外交思想研究》，《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第74页。

② 王海滨：《〈吕氏春秋〉的国家间政治思想》，《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1期，第60页。

③ 《孙子兵法·始计篇》。

④ 同上。

子》这本书了。”他在《战略论》[①]一书中又说：“最完美的战略，也就是那种不必经过严重战斗而能达到的战略——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利德尔·哈特在其力作《战略论》中充分论述了“间接路线”战略理论。该战略的目的是，要使战斗行动尽量减少到最低程度；其主要原则是，避免正面强攻、直接的作战方式，而要首先使用各种手段，力求出其不意地震撼敌人，使其受到奇袭，在物质上遭受损失，在心理上丧失平衡，然后再视情况实施进攻。显然，“间接路线”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继承和发展了孙子的思想。此外，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真正的战争》[②]一书中也运用孙子的思想提出了“相互确保生存”的战略思想。《孙子兵法》强调运用外交手段，主张通过和平协商的政治途径来解决问题。毛泽东同志曾明确指出，中国革命采取武装夺取政权的形式，是被迫的最后选择。新中国成立后他还提出：“第一，无产阶级愿意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第二，假使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无产阶级被迫也得使用暴力。”“革命用战争手段和用和平手段也是两条腿走路。实际上大量工作是用和平手段通过日常工作进行的，战争时间并不长，但最后解决问题还是要靠战争。不用两条腿走路，就不能夺取政权。”[③] 可见《孙子兵法》为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

《孙子兵法》中另一核心思想是“全胜”思想。全胜，实质上是提倡共赢、非战。新中国的国际战略目标，一直是追求建立体现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共同利益的国际政治、经济、安全新秩序，实现各国、各民族之间平等互利共同发展，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威胁或武力，把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维护人类社会和平作为中国的一项伟大事业。由此可见，孙子的思想在国内外都对国际关系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另一种对现代中国国际关系思想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力量就是儒家思想文化。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④] 意思是天地万物我都能够思考、认识，所以天地万物我都具备了。

---

① ［英］利德尔·哈特：《战略论》，钮先钟译，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年。

② ［美］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战争》，萧啸、昌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

③ 《同澳共总书记夏基的谈话》（1959年10月26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④ 《孟子·尽心上》。

反躬自问，自己是诚实无欺的，便是最大的快乐。要尽力按宽仁之道办事，这样才能更接近仁德。总体来说，这是一种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思想。用这种思想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国家间和谐相处、避免战争。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① 意思是打着仁义旗号但靠武力的是霸权国，要称霸一定得有强大的国力；凭借道德实行仁政可以使天下归服，使天下归服的不一定是大国。以力服人，其实被征服的人未必心悦诚服，只是力量不够罢了；以道德使人归服，别人是心悦诚服，就像孔子的弟子信服孔子一样。由此，武力应该轻视，而仁德应该加以强调。我国当前所提倡的"和合"思想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价值取向，与孟子的这一观点有许多相通之处。

孔子的思想也包含重要的带有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国际关系思想。孔子的"国际道义论"是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出发点和基石，是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变量。孔子的"国际道义论"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道义因素是决定国家军事实力的主要因素。所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② 即仁人志士宁可牺牲自己也不会有损仁义。第二，君主或者说国家领导人的道德素养是国家道义的核心组成部分。这就是孔子主义国家关系理论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第三，国际道义因素能够直接增强国家的软实力和硬实力。国际道义能够吸引国际社会中的其他国家，拥有国际道义的国家能够在国际社会中吸引更多国家的追随，赢得更多盟友。正所谓"德不孤，必有邻"。③ 孔子认为没有道义的勇敢是国际动乱的根源，而道义可以从根本上对国家的战争行为起到自我约束作用。他还认为，道义因素能够通过国家行为的自我约束来实现国际社会的普遍和平，道义国家之间不会产生战争，我们可以称之为道义和平论。④ 国家道义问题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孔子"礼之用，和为贵"的国际

① 《孟子·公孙丑上》。
② 《论语·卫灵公》。
③ 《论语·里仁》。
④ 王日华：《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5期，第49页。

秩序观强调有规范的国际体系；在对国际行为体的相互合作上孔子主张“义以为上”的本着包容、仁爱精神的国际合作观；在国家形象观上孔子主张“德不孤，必有邻”。孔子国家间道义思想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建构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即有利于构建和谐稳定的国际秩序，有利于加强国际合作与机制的建设，有利于提高国家间交往的公信力等。①

二、中国近代的国际关系思想

除了先秦时期的国际关系思想之外，近代中国的国际关系实践与思考对中国当代国际关系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其中，晚清政治家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在对外关系上的主张与思想为我国国际关系思想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曾国藩外交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务实灵活。他受倡导“经世致用”的冯桂芬等人的影响，在19世纪60年代末基本形成了“和戎与自强”的外交思想体系，主张讲求诚信、遵守和约、维护利权以及注重实力的外交策略。②

“和戎”即与别国媾和修好，“和”是长期以来中国的外交基本准则。一方面，曾国藩总结道光皇帝以来国家的外交得失，认为外交必须有“一定之至计”，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来之所以得到了十余年的中外相安，就是因为遵守和约。据此他提出了“和戎”的外交方针。首先，与传统的“和戎”思想不同，此处的“和戎”以承认不平等条约为前提。曾国藩并没有死守“天朝上国”的观念，而是清楚地认识到了当时清朝的状况。其次，这种“和戎”的思想以“不寻衅”为条件，主张对外要“和让”，而不是以“天朝上国”自居、企图驯服侵略中国的西方列强，这体现了当时新形势下中国的新选择。

另一方面，曾国藩认为“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为下手工夫”。即通过改革政治、整顿军事、培育人才

① 余丽、董文博：《孔子国家间道义思想与当代国际关系建构》，《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第50页。

② 李传斌：《从传统到近代的嬗变——曾国藩外交思想浅析》，《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4年第6卷第1期，第46页。

来实现自强。他将外交与实力相结合，体现了近代外交的实力原则，并且将外交与国家内政紧密结合，主张从整顿内政、提升国家实力途径来缓和冲突、谋求妥协。

作为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继承了他的外交思想。在长期主持对外交涉事务的过程中，李鸿章始终以1861年清政府对外关系最高原则的“按照条约，不能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为指导，[①] 并广泛吸收和发展了曾国藩、郭嵩焘等人阐述的“诚信”“循理”外交思想的合理因素，努力将传统的儒家“和戎”思想应用于近代对外事务，力图寻求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保证清朝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需要指出的是，“和戎”绝不是拱手听命。这只是李鸿章外交方略的第一步，并非是终极思想。虽然李鸿章办外交带有一定的妥协性，但并不妨碍他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进行有限的御侮斗争。他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为寻求中国平等独立地位所进行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活动，在很多方面具有开拓性，并值得我们借鉴。李鸿章认为，同洋人打交道，既不能像“沪道（上海官绅）媚夷，失之过弱”，又不能像“汉道抗夷，失之过刚”，[②] 而应介于两者之间，采取“刚柔调剂”，以不卑不亢的态度，以儒家信条“忠”“信”“笃”“敬”四字处之。李鸿章正是“遵师训”，并结合同洋人交涉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外交的总方针：“委曲周旋，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③]

李鸿章外交方略的第二步是遵守条约，力保和局，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保全和局”是李鸿章外交思想的重要环节，是“和戎”的补充与发展。他认为“明是和局，必阴为备战，庶和可速成而经久”。[④] 近代中国签署的丧权辱国的条约，有一部分就是受“遵守条约，力保和局”思想的影响，把国家推向了灾难屈辱的深渊。

第三步是“以夷制夷”的外交方略。李鸿章借鉴了战国时期“合纵连横”的外交思想，利用在中国瓜分利益的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使其相互牵制。首先，采用“各国均沾”的政策，使各个国家均有利益获得，使其相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页18。
② 夏东元：《晚清洋务运动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08页。
③ （清）李鸿章撰，（清）吴汝纶编录：《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九，金陵，1905年。
④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四。

互牵制，防止特权。其次，借一国或几国之力来抗拒或缓和另一国对中国的侵略。例如，在与八国联军谈判过程中，李鸿章认识到八国之间有着无法调和的矛盾，因此利用这些矛盾减少了国家的损失。

这些晚清外交思想为中华民国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所进行的对外交涉提供了借鉴。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际关系思想

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等领导人根据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及时调整中国的对外政策，不仅在国际舞台上维护了国家的利益，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还为我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开辟了道路，也为新中国国际关系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毛泽东的国际关系思想

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提出了许多延续至今的国际关系战略思想。虽然在新中国初期我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但后来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毛泽东提出了既坚持原则又具有灵活性的外交政策。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重点是创建新型周边关系和处理好大国关系。①

毛泽东的国际关系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求同存异、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睦邻原则。1954 年 10 月，毛泽东在同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时表示，东方国家都受到过西方帝国主义欺辱；要看重两国的共同点而不是思想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不同；国与国之间不应该相互警戒；等等。1954 后 12 月，在与缅甸总理吴努会谈时他也表示过“国家应该不分大小”“革命不能输出”“不干涉内政”等观点。②

其二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现代化战略。自力更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贯主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

① 曹泳鑫：《毛泽东新中国国际战略思想理论的特点》，《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 年第 2 期，第 52 页。

② 《同缅甸总理吴努的谈话》（1954 年 12 月 11 日），《毛泽东文集》，第 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年。

东就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①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② 然而，随着两大阵营相互对峙的局面逐步形成，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阵营持续摆出对抗姿态，坚持对新中国实行孤立封锁政策；另一方面，同属社会主义阵营、曾经关系亲密的苏联，也开始与中国频频交恶，互示强硬。在这样的局面下，新中国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保持住自己的经济立足点，没有完全依赖苏联。这种对外关系上的自力更生姿态逐渐孕育出中国共产党在三个方面的思想动机：第一，促进国内发展；第二，避免依赖外国；第三，要改革世界经济。

其三是变革国际旧秩序、实现人类和平的理想。在马克思主义的洗礼下，中国共产党人将传统的和平思想融入社会主义理想当中，把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幸福融入个人一生的志愿当中。这种理想不仅具有道义色彩，而且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支持，其运用阶级分析法、社会生产力发展动力论与和平共处思想，代替了西方的传统伦理秩序观、势力均衡论与调和主义，站在被压迫民族与弱国的立场上，反对大国主义，提倡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这些思想对于新中国初期处理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起到了促进作用，有利于为新中国的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在分析国际问题方面，毛泽东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是矛盾论。将矛盾论运用在国际关系问题分析上，就是将国际体系分为不同层次并阐述其矛盾关系。例如，毛泽东分析当时世界上的主要矛盾有四种——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殖民地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这些不同的矛盾相互之间发生影响，因此毛泽东曾提出在实践中要善于利用这些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尚有可供革命利用之矛盾，因此，必须利用之。苏联必须利用之，印

① 《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1945 年 1 月 10 日），《毛泽东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917 页。

②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 年 3 月 5 日），《毛泽东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435 页。

度必须利用之，中国必须利用之，一切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必须利用之。”[①] 在这种对矛盾的利用中，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论”，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划分为第一中间地带，将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日本划分为第二个中间地带。这一理论为中国的外交工作制定了新的战略目标——加强与亚非拉等被压迫的经济落后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反对大国控制，坚决捍卫民族独立与自主；在平等互利原则上处理国际关系，为社会主义建设营造良好国际环境。

实际上，早在1946年8月，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采访时就首次提出了“中间地带”理论。毛泽东认为，在当时世界上，美国和苏联之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上进攻苏联的。20世纪60年代，他又对“中间地带”理论进行了完善，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理论。1962年1月，毛泽东在会见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理事长安井郁时表示：“社会主义阵营算一个方面，美国算另一个方面，除此之外，都算中间地带。”同时，他将中间地带国家划分为四种不同类型的国家：殖民地国家；被剥夺了殖民地，但仍有强大垄断资本的国家；真正取得了独立的国家；取得了名义上的独立，实际上仍然是附属国的国家。1963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又将这四类国家概括为“两个中间地带”，即“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1964年7月，毛泽东在同日本社会党人士谈话时又进一步指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毛泽东认为，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是可以争取和团结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力量。为了抗衡对世界和平威胁最大的美国，可以建立起包含苏联和广大中间地带国家和地区的、最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随着新中国科技水平的提升，原子弹、氢弹爆炸和人造卫星的试制成功，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在此基础上，面对激烈变化、迅速改组的国际世界，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

① 《目前时局与党的政策》（1940年7月），《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86—292页。

1974年2月，毛泽东从战略意义上提出了“三个世界”这一概念。在会见来华访问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①] 1974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全面阐述了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并且郑重声明“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国家”，“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

从“中间地带”理论到“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再到“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这些理论的提出显示出毛泽东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力图在急剧变动的世界格局中为中国争取有利于生存和发展的国际环境的不懈努力。作为分析由美苏两极格局向新的世界格局发展演变的国际战略理论，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尽管带有时代和历史发展的局限性，但是为中国外交顺利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铺平了道路。[②]

（二）周恩来的国际关系思想

周恩来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奠基者和享有崇高国际威望的外交家。早在新中国成立前，他就是中国共产党外事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他的国际关系思想是马克思基本原理与当时的国际关系相结合的产物，其根本目的是希望在利益和矛盾并存的国际关系中，寻求和平合作，避免战争冲突。周恩来的国际关系思想覆盖领域广，内容丰富，具有系统性。1953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会见印度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1954年6月周恩来在访问印度、缅甸期间，分别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发表《联合声明》，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是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创举，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关

①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中国政府网，2007年9月6日，http：//www.gov.cn/ztzl/17da/content_739787.htm。

② 李捷：《正确理解“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历史内涵》，《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3月1日。